

·会议综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人口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暨《中国人口科学》创刊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建武 齐天骄 徐诗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此,《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在《中国人口科学》创刊 30 周年之际,于 11 月 17 日在广州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人口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暨《中国人口科学》创刊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60 余篇。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经济、新形势下的新就业理论与政策

关于新经济与新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新经济与新就业》的演讲。他认为,新经济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以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新技术经济”和“新业态经济”。其中,“新技术经济”是指以研发新技术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新业态经济”是指利用新的科技成果、新兴技术组织生产要素,从现有产业中衍生的新环节、新链条、新商业运行模式。

新经济作为新的动能,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与 5 年前相比,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成功更有信心。新经济还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的劳动力形势是供不应求,特别是在新型产业中,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需求远大于供给。虽然目前传统经济还占很大份额,但新经济的快速增长已初步显现,而且必然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并保持新的高增长率。其原因是新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远超过社会总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由于新经济具有市场性和计划性的融合、标准化和差异化的融合、生产和消费的融合、金融属性和实体属性的融合、竞争性和垄断性的融合等特点,在新经济中,市场性和计划性已经开始融合。在传统经济中之所以能够大规模的发展,是因为其具有标准化的优势。但当新经济出现的时候,差异化就可以开始实施,而且成为新

的一种商业模式。

FDI 对中国的就业具有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国内就业影响。姜巍教授研究了中国近些年的 OFDI 对国内就业影响的整体效应与区域差异,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中国通过大量吸引 FDI 流入和出口扩张拉动国内就业与增长。从宏观供给视角看,OFDI 对母国产出和就业的影响渠道不仅表现在对要素投入数量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技术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研究显示,中国 OFDI 对国内就业的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短期对就业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长期来看则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从区域来看,OFDI 对国内就业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因此,企业“走出去”不但要注重规模,更应注重质量;鼓励政策的指定要考虑地区差异;还要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完善国内市场制度环境;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不论在经济危机前还是经济危机后,政府在促进就业中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自 2002 年引入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就业资金投入不断加大,2016 年中央财政就业专项资金达 438.775 亿元;就业促进政策种类也不断增多,包括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公益性岗位、小额担保贷款等。李锐教授基于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验证个体和宏观因素在不同政策项目选择中的地位,并据此对项目进行分类,分析不同类型的项目中是否存在“撇脂效应”及其严重程度,还根据个体因素和宏观因素主导地位的不同将项目的选择过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项目包括小额担保贷款和社会保险补贴,由宏观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主导政府决策,第二类项目包括职业培训,宏观因素在政府选择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第三类项目包括职业介绍和公共岗位,个体因素在选择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第二类项目职业培训存在严重的“撇脂效应”。李锐还提出:(1)政府作为公共项目的主要提供者,在项目实施前应充分了解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配置劳动力政策,开展多层次社会项目,满足不同需求,充分发挥政策效力。(2)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和激励机制。(3)充分依托市场机制,积极引入第三方培训机构,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开展就业培训服务。

人口老龄化是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的现实,中国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这一新问题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供给也带来挑战。王桂新教授借鉴日本经验来讨论老龄化问题,他认为人口的发展是一代一代由劳动年龄人口(支撑侧)支撑抚养非劳动年龄人口(被支撑侧)而延续的。人口的老龄化也就意味着被支撑侧——非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增大。当被支撑侧(非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增大到支撑侧(劳动年龄人口)不能支撑时,面临多种选择:增强支撑侧供给能力、减小被支撑侧消费压力,而“一举两得”的

做法则是把被支撑侧有条件的老年人转移到支撑侧,即老年人的劳动雇用。王桂新教授通过数据进一步说明目前的日本老龄化程度,介绍了少子化及不同就业层次的老龄化。并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进行了对比,提出以下建议:(1)充分认识老年劳动力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人口红利”;(2)坚定不移地贯彻就业优先战略,鼓励雇用老年人,创新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形式,创造雇用老年人的岗位与环境;(3)推进积极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产业;(4)制定老年劳动力雇用法。从法律、制度上保障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权利;(5)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内增设老年劳动力雇用相关管理服务机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人口、产业与就业新问题

产业与就业关系协调与否是衡量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产业是发展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两者事关国计民生。当前,中国正处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转型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挖掘不同产业的就业增长潜力,是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相协调、保增长与惠民生协同推进的关键所在。

关于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者的关系,逯进教授基于中国 31 个省份 1993~2015 年面板数据,构建并运用三系统耦合模型,测算了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及耦合特征,并结合空间重心距离分析,讨论了三系统耦合的时序变化、空间分布及匹配状况,以此审视了当前中国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中国人口结构和产业发展均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但人口结构自 2015 年起出现转变,加之供求结构自 2003 年以来失衡加速,导致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缓慢;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二系统的良性耦合对于三系统耦合具有支撑优势,但这一优势可能会因二者空间匹配程度的下降、空间配置效率的降低而受到削弱;“人口结构—供求协同”和“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两类二系统耦合的空间配置效率则正逐步回升,对三系统耦合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因此,人口红利消退与供求结构长期恶化同时存在,且高强度供给侧改革下,供求协同情况好转,“供求—人口”、“供求—产业”的空间配置效率正逐步回升;但区域发展仍具有不平衡性:广义的中部塌陷蔓延,省内的差异十分明显。由此,政府应从基础支撑力、拓展支撑力及供求侧三方面着手,增加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创新强度,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和增加高质量供给。

就业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但中国的官方发布的数据当中忽略了很多非正规就业的情况。张抗私教授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间也存在较高的工资溢价现象,非正规就业者不仅面临工资薪酬比较低问题,且往往在边缘化、较低端行业进行劳作,就业质量一般也比较低。张抗

私教授将非正规就业者定义为:非正规受雇者和自我经营者。非正规受雇者主要包括在非正规部门中领取工资的家庭帮工、临时工和正规部门中的短期临时工、非全日制就业和劳务派遣工,其中正规部门又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外资合资企业、民营和私营企业。张抗私教授还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方程进行了 OLS 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上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教育收益率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趋势。同时,性别歧视较为严重,这与现实中高收入群体中男性占比较大、在低收入群体中女性工资更低的社会现象吻合。张抗私教授认为,中国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工资分布低分位数水平上的差异造成的;正规就业者与异质性的非正规就业者之间工资差异均符合“黏地板效应”。因此建议:(1)中国政府等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和正规化改革进程;(2)基于非正规就业的异质性,相关收入分配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工资分布低分位数水平上的非正规受雇者面临的就业问题。

就业培训既是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也是一个国家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源泉。但政府决策面临财政约束和压力,需要进行政策取舍。胡永远教授对公共培训和私人培训效果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公共就业培训的效应普遍不强,针对不同群体,培训效果也差异很大;而中国的培训效应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他认为,参与公共培训没有显著的工资效应,却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因此,政府很可能将就业指标当作公共培训效果的主要考核指标,这一结论为已有研究“公共培训无效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就是说,公共培训无效仅局限于工资效应,既可能是培训质量或参与者个体素质存在问题,也有可能是参与者就业的岗位低端。然而,公共培训的就业效应也是一种相当好的正效应。此外,私人培训高收益率表明市场培训数量不足,但总体来看,公共、私人培训均有效。

有学者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出发,厘清出口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专业化、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出口专业化对本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于其他区域的溢出,明显高于对本区域的效应。因此,中国应依据出口专业化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正向作用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各地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补助、国际结算等财政和行政手段扶持高新技术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培育高科技自主出口品牌,要优先支持同一行业的企业在该地区集聚生产,提升出口专业化水平。“摊大饼”、“贪大求全”的地方要及时调整政府的政策;企业要在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对应的专业化集聚程度高的地方进行布局生产。

目前中国建立在大量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和贸易面临“人口红利”耗尽的局面,就业人口的质量和结构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有学者根

据对 38 个行业的数据测度,发现很多行业就业出现了更多的跨行业配置,尤其是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的作用差异比较明显,体现在对外贸易对产业更新换代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则不显著;但产业升级对就业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剔除产权和垄断因素之后,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和就业有显著影响,且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上远远大于贸易结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三者增长的非同步性。在中国和世界处于同一个下行周期的情况下,需要在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改善两个之间进行优先序的选择,进一步通过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形成新兴产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扩张,进而推动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城市抓住契机大力发展制造业。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减等因素的影响下,制造企业低成本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加速弱化。有学者以东莞为例研究了东莞制造企业“机器换人”对人工成本的影响。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加速弱化,东莞市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机器换人”。市政府设立了东莞市“机器换人”专项资金,从 2014 年起每年出资 2 亿元,连续 3 年共 6 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研究表明,机器换人企业会显著减少用工人数量,在劳动供给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因为新技术型的机器换人使劳动需求减少,抑制了工资持续上涨。此时,大专生聘用比例的提高也并没有减少企业用工人数量,没有出现以高薪资的高技术性工人来替代现有工人的现象。

三、新常态下的人口城市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为 2.45 亿人,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

童玉芬教授就发挥首都核心功能的北京市劳动力需求与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北京市的功能定位经历了多次调整,目前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这个中心定位的改变标志着北京从一个普通的、一般性的特大城市,变成了一个首都功能性质的特殊城市。童玉芬教授通过计量方法,在区分了北京市的基础行业和非基础行业,以及非基础行业中的生产性服务行业与生活性服务行业后,提出在保证当前首都核心功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首都最低人口规模应小于那些规划的人口规模,如 2020 年的 2 300 万人口。规划的人口规模与最低人口规模之差就是需要疏解的人口。按照 2015 年实际值和 2010~2015 年平均值计算,北京最低人口规模分别为 1 640 万人和 1 825 万人;北京市维持核心功能的就业人数为 327 万左右,人数总计为 635 万左右。据此,首都功能的运行建立在特大城市本身基本功能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离开城

市本身的功能谈首都功能是很困难的。疏解北京市非首都核心功能绝不意味着将核心功能以外的产业和人口都疏解出去,而是应该适当保留相应比例的生产性配套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产业与人口。

城市化是劳动力在城乡及城市间转移的动态过程,研究交通拥堵对城市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对于理解交通拥堵在区间联系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有学者基于空间关联视角,利用中国 2003~2014 年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研究城市道路交通密度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城市自身及其他城市交通密度的提高,城市化水平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形”发展趋势,且多数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道路交通密度超过最优密度值,已出现明显的拥堵效应。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挤效应的有效空间作用范围平均为 300 公里,但不同等级城市差异较大,Ⅰ型及以上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的交通拥挤外溢效应空间边界分别为 450 公里、350 公里、300 公里和 150 公里,且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则交通拥挤的空间外溢效应也明显。因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挤效应并非局限于本城市,而是能够扩展至除本市以外的更远空间范围。

与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流动相比,中国流动劳动力的“社会融入”情况则不尽如人意。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并由此形成的各类制度壁垒,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资源,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流动儿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其随迁子女健康水平影响的决定因素,对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对 2014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劳动力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短期来看,由于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女性孕产期的医疗保健水平,应增加城镇地区的医疗供给,特别是对于劳动力流入较多的城市地区,要增加基层(社区、街道)的医疗供给。在长期,公共政策的调整方向要致力于消除城乡分割。在城乡分割的格局下,农村劳动力举家迁移到城市后,仍将面对各种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这种现象一方面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实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可能造成“城市二元结构”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流动儿童健康福利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将受阻。因此,公共政策的调整要更多地惠及外来劳动力家庭,从医疗、入学及社会保证层面给予倾斜。

十九大报告提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刘昌平教授认为,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经提出要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并在 2010 年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写入《社会保险法》,此后 2012 年在“十八大”、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也反复强调“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目标。如今,“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再次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但实际

上,中国过去从市、县级统筹向省级统筹的过渡并不顺利,传统方法和路径未能有效解决提高统筹层次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总之,“六统一”标准下的“省级调剂金制度”并没有真正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在省级层面的统收统支,而是依然分散在市、县一级,与之前没有根本差别。刘昌平提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制度“碎片化”、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割、社保信息平台的建立和统筹后,养老基金的投资增值等关键问题,以及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路径,即从地市级统筹和省级调剂基金到省级统筹和全国调剂基金,最终达到全国统筹的目的。全国统筹后,必须规定明确的和统一的缴费基数核定办法、缴费率,并建立完善的社保信息平台,加快金保工程发展步伐,借此将纳税收入和缴费基数对等起来。这对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经济结构、就业、人口等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胡必亮教授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况、问题与前景”的演讲,他从“为什么、干什么和怎么干”3个方面详细地介绍来“一带一路”的背景,并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沿线国家的近况与问题,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1)能源优势十分显著,供需合作前景广阔;(2)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互补发展潜力巨大;(3)结构转型已经启动,外力推进空间不小;(4)目前挑战仍然严峻,“一带一路”助力解决;(5)政治治理水平较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6)需要确定未来发展战略,明确重大政策选择。全球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后,从9%的经济增长下降到6.5%,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因此提出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到国外去创造新的经济。“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面对全球,覆盖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各个国家都要把自己的发展战略与全球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一带一路”也非常契合联合国2030年的发展战略,使各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工业上存在很多的需求,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

此外,与会者还对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劳动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探讨,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同时需要对人口、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进行调整,以适应改革的需要。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责任编辑:朱 犁)